

章韶华  
主编

首届中国文化观念  
变革研讨会文选

# 改革开放正在 掘进岩层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改革开放正在掘进岩层

——首届中国文化观念  
变革研讨会文选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97 号

**改革开放正在掘进岩层**

——首届中国文化观念变革研讨会文选

章韶华 张品兴 主编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317 (千) 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平) 9.80 元  
(精) 14.80 元

ISBN 7-5043-2400-0/G·875

名誉主编	黄枋森	沙 洪
主 编	章韶华	张品兴
副主编	李景瑞	柳可白
	任俊明	陈志良

# 改革开放正在掘进岩层

——写在“首届中国文化观念变革  
研讨会”<sup>\*</sup>召开之际

(代序言)

章韶华  
张品兴

## 一、引 语

人类的存在有它的层次：自然性存在是最基本的层面，向上是社会性存在，再向上便是文化性存在。

因此，人类的需要也有了顺序：最基本的是物质性需要（吃、喝、住、行、性等），向上是社会性的需要（交往、结社、国家等），再向上便是精神性（文化、伦理、价值等）需要。或如恩格斯所讲：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

因此，人类的发展也有了秩序：常常是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接着便主要地转变为制度文明建设，接着是精神文明或文化文明

---

\* 由中国文化观念变革研究所发起、《民主与法制》社、北京现代管理学院主办的“首届中国文化观念变革研讨会”，于1992年6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来自首都和外地部分高校和科研单位、国家机关、新闻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记者及干部参加了会议。

的建设。

人们常常把人类或地域或民族的历史阶段划分为不同的时代，但是设若把不同的时代联系起来考察，或者把某一时代的不同阶段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经济→制度→文化→经济……的螺旋形圆圈。或者说，人类文明的阶梯必然表现为：科技→民主→文化→科技……

因为，文化是人类或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所构成的最深层的软件构造；是漫长的历史所积淀下来的最内在的“岩面层”。

因为，物质或经济层面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或政治层面的发展，而它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又必须由精神、观念或文化层面的发展来总结、升华。不仅如此，只有文化、精神或观念转变了、进步了，才能推动经济和政治的新一轮的发展。

我国的发展也是这样：

以近代史为例：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炸开了封闭了几千年的天朝帝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中华的大刀长矛的强烈反差，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落后是由于物质和科学，从而兴起了洋务运动；西方的物质和科技引进后，经济变化了，但中国的社会依旧、制度依旧、政治依旧，于是导致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政治体制的革命；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流产，使中国人迅速转向了文化、精神、观念的自我批判；这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现代史为例：我们党先进行了推翻三座大山、土改、镇反<sup>\*</sup>等运动，接着便是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又转向了尽管失败了“文化大革命”。

即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的历史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很快便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实行了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包”字进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很快遇到了僵化体制的束缚，于是又转向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体制改革遇到了右的特别是“左”的方面的各种干扰，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顾 88 岁的高龄，南下深圳、珠海、广州、上海，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考察中，构思出了著名的“南巡谈话”。“南巡谈话”与其说是基于我国经济、政治上的考虑，毋宁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宣言。它那转变计划与市场观念的论述；转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观念的论述；它那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慷慨言词；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用以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伟大召唤，难道不是一篇“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吗？

问题已经很清楚：经济政策、政治方针起的是一种外在的有形的指导和引导人们思想、生活和劳动的作用，而文化和观念则起着一种内在的无形的支配作用。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召开了这次“首届文化观念变革研讨会”；

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才写下了这个题目：改革开放正在掘进岩层。

## 二、一种最深层面的“国情”

简单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有两大优点：

一、具有极强的融合力。在它的开始，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地理关系，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国传统文化成了世界上最悠久的、最博大的文化之一，它的形成几乎融合了中华众多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汉朝之后，随着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于是，争鸣着的“百家”，又程度不同地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明末清初之后，还容纳了基督教等准西方文化。这种得天独厚的融合力，形成了巨大的智慧力、溶解力和丰富性、

广泛性的传统。

二、具有极大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既包括合现实之理，也包括合人性之理。中国的历史非常特殊，它不像西方诸国。西方诸国在奴隶制解体之后，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越来越交错穿插、互敌互补，而中国则一直是“中央大国”，始终为等级森严、网络有序的宗法、宗族这两系经纬丝绳所编织的坚强而又无形的“网”框罩着，在这种地理、社会、人际环境中，只能也必须由适合于“农业的封建的”这一中国国情的那种“农业的封建的文化”来统摄。另一方面，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中国人，既有不同于西方民族的那种独特的国民性，又有作为人类所共有的人类共性，而中国的这种讲“仁、义、理、智、信”的儒学、讲“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学等等，恰恰既能满足这种国民性和一定的人类共性。

这些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完善，必然越来越具有系统性和稳定性，最后，“中国文化”成了一个世界文化史上极难产生但也极难消失的具有自循环功能的超巨系统。我们应当为我们有这样的传统文化感到由衷的自豪。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背后，也潜含着缺点和优点并具的特质。

一、具有极强的惰性力。一般而言，人们的经济生活变了，政治生活就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而文化生活又会随着经济、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中国文化却有着极强的惰性力。借用一首歌词所唱的，就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经济上、生活上“跟着感觉走”，骨子里的那种“非感觉层”或“潜意识层”则仍旧“跟着传统走”。可见，传统文化的这种惰性力是中国人中的一种最深层面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存在物。其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嘴上说的是“改革开放”，而实际上改掉的是碗里的

“东西”、家里的“东西”；放进来的也是外国的“东西”、别家的“东西”，至于观念、文化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对不起：改不了，也放不进来，即便放进来也没用。所以，前几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吃的是肉，而你吃的却是山珍海味，岂有不骂之理。根源在哪里，“不患穷，患不均”么？！

二、具有极大的同化性。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由长期内部战乱的刀枪箭矛写成的历史。皇帝绵绵，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文化却“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秦之前，自不必说。秦之后，它也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在文化层面上取代过。恰恰相反，它同化了所有企图染指它、摧毁它的任何其它文化。进一步看，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代表农民意志、群众意向而举起义旗并且由寇成王的领袖，可是，又有哪一个不是借儒道之雄风造反、依儒道之古训称王的呢？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像一块由五光十色、用途各异的磁石块做成的巨大的魔方，把异己的、外来的东西先是吸收进来，接着磁化掉。先进的东西一旦进入这个磁场，就会成为腐朽的；鲜红的东西一旦进入这个磁场，不久就会成为紫血色。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上述优点和特性，所以，中国当代文化的观念的状况也是很奇特的。

比方说，从中国历史上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取得了主导地位，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革，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西方产生的文化、一种集纳了人类全部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第一次在中国文化大地上生了根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文化以它的优点欢迎了它、容纳了它，像把17世纪以后的几届王位让给了满族人一样。然而，很快，中国文化便染指了它、改变了它。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若不是绕道苏联、若不是在苏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若不是立足于“农村公社”的俄罗斯文化与中国

当时的文化极为相似，若不是我们党正确地选择了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若不是革命队伍主要来自农村，若不是把矛头主要对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政治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中国历史恐怕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即便如此——像清政府原本想用满文化统摄中国人的心灵，结果反倒被汉文化给汉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也被纳入了中国农业的封建的老传统文化的惯性运动，并被这样那样地给予了同化。这种情况，正如有位同志在会上发言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被封建集权主义所变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观念被传统的绝对平均观念所过滤；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理论被中国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所渗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被中国传统的经验化了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所同化。比如，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规范现代化大生产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不产生：把儒家文化指导与现代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的“新思路”，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新预言”，以及被我们透过传统文化这架墨镜盯住了的“新加坡道路”，——如此等等的新思想。

的确，只有吃透了中国的国情，才能建设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上述状况，以及用传统的文化和观念来观察和解释中国国情的状况，难道不正是中国的一种国情吗？！

人们该是把中国的文化与观念的状况作为一种最深层面的国情来对待的时候了。

### 三、嘻嘻，精神矛盾综合症！

我们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国文化简略地划分

为三种：一是“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这是以儒、道、释为指导的一种农业的封建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旧传统文化；二是从“五四”开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70 多年的文化，这是一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以苏联文化为模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或者说，这是一种新传统文化；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化，这是一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或者说，这是一种当代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尚处在形成中。应当说，这三种文化既有着血缘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否定历史和歪曲历史是不道德的。比如，没有中国旧传统文化那种极强的融合力和合理性，就不可能在中国产生出新传统文化；同样，没有这种新传统文化，也不会发端出当代中国新文化。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并不就是合乎后来的真理，现实的并不就是必须的。社会不是由真理来指引的，相反，它常常是由错误来推动的。没有“文化大革命”中的“迷信盛行”，决不会有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没有“苏联模式”的教训，绝不会有“中国特色”的思路。

但是，我们确实不能不注意到老传统文化对新传统文化的那种基础性影响。许多同志至今记忆犹新：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理解怎么能执行？怪，包括你我在内的许多人就能自愿执行；捧的是“铁饭碗”，可是天天只能喝一点稀粥，没有饭光有铁的钢的饭碗有什么用？怪，就那样心甘情愿地捧了一年又一年；天天念“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没见过、敌人那边没去过，怎么就知道人家一天天烂下去呢？怪，就这么坚信不移。这种情况，说来说去，还在文化上、观念上，在于用习惯了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我们也确实不能不注意到新老传统文化对今天中国人的深层

传染。会间休息时一位朋友聊天说：“中国人在‘文革’得的那种‘精神矛盾综合症’至今没有痊愈。邓小平同志批评的那些‘左’的理论家、政治家就像‘理论警察’、‘政治警察’，动不动就给您一警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下面的同志只能是说一套、干一套、想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回家又一套；右的理论家、政治家则硬要把农村的拖拉机拆掉，改装成航天飞机，说是开着到月球上逛逛。其实，这都是‘精神矛盾综合症’的典型症状。”有人听着听着，笑了：

“嘻嘻，精神矛盾综合症。”

嘻嘻之余，不免让人陷入沉思。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在它的精神上、心灵上、心理上常常陷于矛盾之中，就难免会像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样常来些异常言行。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并且影响如此广泛、久远？恐怕根子还在文化上、观念上。以“批判资本主义”为例。对于资本主义，我们长期以社会主义自居而奉行“对着干”的政策：它搞市场经济，我们就搞计划经济；它搞两极分化，我们就搞平均主义；它搞言论自由，我们就挥舞姚文痞式的棍子；它搞纯私有制，我们就搞纯公有制。其实，这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主义态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大弊病。但是，这个弊病是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内部的弊病，也是必然要带有的弊病。如果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如资本主义、经济上还不如资本主义发达，如果不吸收资本主义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先进经验，怎么可能去克服这种弊病呢？这犹如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就要矫正孩子的走路姿势一样幼稚可笑。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我并不想打出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只是在打破旧世界的过程中来建立新世界。可是，这种做法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要归结到封建的农业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即用它对

待马克思主义进而对待资本主义。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正确的，错误和失败的根源惟在于我们是形式上的、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实质上有些地方则是农业的封建主义。因此，严重的问题在于变革我们的文化、转变我们的观念。

#### 四、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

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的总体变革。四者相比，观念变革或许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社会行为是有目的的，人的行为受观念支配。任何社会变革的要求和趋势，都必须转化为人们的观念，通过新旧观念的冲突、互补，完成适应社会变革的观念转变，才有可能。1942年的延安整风，转变了党和人民的观念，方才取得了中国解放的伟业；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转变了党和人民的观念，方才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迈开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步伐。所以，观念变革，一方面，它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深层的反映和最高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深层的前导和最强的动力。那么，当前我们应当转变哪些旧观念、树立怎样的新观念呢？与会者提出了不下20个观念必须变革。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以下五种观念必须转变。

第一，转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上长期形成的绝对对立的观念，树立二者辩证统一的观念。这里实际上牵扯到三种观念的转变：一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观念，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三是关于二者关系的观念。

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反对以“三宗”（宗法、宗族、宗教）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制度中建立起来的。针对“三宗”，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提出了“民主、平等、自由”的伟大口号。但是，在这一

伟大的激动人心的口号里面，却隐含着—个深刻的矛盾：生产、经营即经济上的自由化，造成了现实的不平等和不民主；政治上的民主化，造成了现实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如此等等。面对这一深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现了克服这些矛盾的正确方法——搞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解，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说，它在经济生活上至少要比资本主义丰裕、在政治生活上吸收了但又提高了资本主义的民主质量、在精神生活上吸收了但又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人与人关系上吸收了但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平等。道理很简单，要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克服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消除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病”和“遗迹”，必须借鉴和吸收并且具备了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和优秀的成果，才有可能。这同资本主义吸收和借鉴了封建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道理。如果人们硬要用经济上贫穷的、体制上一大二公、精神上教条盛行、组织上任人唯亲、任人唯派，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可能去坚持实际上还不如资本主义、倒像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

恰恰如此，——我们常常是用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的封建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从道理上讲，由于资本主义革了封建主义的命，所以最恨资本主义的是封建主义，而社会主义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有比资本主义更宽阔的胸怀，是因为它能正视和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优秀成果。如此说来，几十年来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特别是所理解的二者的对立关系，就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假的理解了。我们常常讲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常常讲世界上任何联系和发展都是辩证的，既然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其关系上，难道不该讲讲唯物辩证法么？

第二，转变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关系上长期形成的绝对对立的观念，树立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观念。

人本主义原属于一种哲学观念，它以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由于这种观念主张以人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把人放在第一位，加之它在反对当时的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中起过重大的积极的作用，所以，人本主义逐渐地渗透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用以反对从物出发、从上帝出发、从宗族、传统、权威出发的一切不从人出发的国际性思潮。

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它那脱离具体历史、社会及阶级关系去解释人的片面性，从而也克服了它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弊病，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它在认识人上的片面性、唯心论，并不是不讲从人出发了。相反，马克思主义所以为马克思主义，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坚持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人出发的主义，恰恰在于它是一种为了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人的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出发、从阶级出发、从经济出发、从群众出发的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从上述出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比方说，以前的社会学家、政治家坚持从个人出发，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从群众出发。可是，“从群众出发”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集中群众的智慧来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吗？相反，它绝不是依靠群众去斗干部，也不会是发动群众去斗群众，当然也不是引导群众去高呼万万岁。所以，从群众出发既可以通向封建主义的那种非人道主义，也可能通向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还可以通向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而只有这后一条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因而也才是真的社会主义。因为，只有这后一点才真正体现了人本主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唯一科学的认识

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作为世界观，它又是一种唯一科学的人本主义理论。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反倒论成是绝对排斥人本主义的理论，真乃奇哉怪哉！

第三，转变单极、封闭、独尊的传统文化观，树立多样、开放、互补的现代文化观。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如远东文化、玛雅文化、印地安文化、黑非洲文化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有着极强的再生性。自从孔子全面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予以理论化之后，便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灵和骨髓。历史上确实不乏问孔、倒孔、反孔之辈，但结果却是儒家理论一次又一次的强化。

儒学本始于民间，不久便成为统治阶级的理论基础，千百年来，几经风雨，越发如此。儒学发端于中国，不久便传到南亚、特别是东亚，千百年来，几经演化，越发纯粹。秦始皇为灭孔曾焚书坑儒，结果以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结果引来了蒋介石专程去孔庙朝拜孔圣人。应当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是孔学最不好过的日子，从毛泽东同志的早期著作中对孔教的控诉，直到“批林批孔”，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而结果却是“百年”之后的整修孔庙以及新儒家的再次兴起。

无独有偶，以“四小龙”称雄于当代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则以“儒学文化”为兴域之旗。以至于搅得我国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纷纷呼吁以宏扬儒家文化的方式来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甚至一些企业家也把儒学文化的精髓当作自己的企业精神。然而，正如有的与会者所指出的：“儒学文化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并无深刻的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不但游离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之外，而且阻碍了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因而对四小龙的现代化

进程起到了一种阻滞作用。所以，儒家文化在当前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不能及时完成某种观念的转换，衰落就是它必然的命运”。

的确应当看到，无论我们对于自己的东方文化，还是西方人对于他们的西方文化，确实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骂自己的祖宗”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下，一些东方人高呼“要全面西化”，而一些西方人则如饥似渴地移植“东方神秘主义”；另一个是“骂对方的祖宗”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下，有些东方人满含热泪云集孔庙去祭祖，而有些西方人则视东方文化为“黄祸”。

面对这种片面的文化观，一些冷静的学者提出了“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体用文化观”。可是，由于“体用”了几十年终不见成效，于是另一些学者则又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东西文化观”。但是，另一些人很快发现：西方文化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仍摄御着西方人的头脑，而我们东方文化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也还统辖着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

那么，出路何在呢？对此，我们要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的发展与变化离不开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它以政治的社会的特别是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二是它自身的矛盾以及与它种形态的文化的矛盾为动力。由于第一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是由多样性的文化特质构成的体系；由于第二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还应当是一种开放的文化；由于第一点和第二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又必然是各种形态的文化进行互相补宜的产物。反之亦然：由于它是开放的，必然是互补的；由于它是互补的，必然是多样性的统一物。

按照这种文化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表现为吸收了西方及世界其他文化的积极因素的一种东方文化，就像比